

2004

梧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 内部发行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梧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组编

YU/2/17

梧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梧州民族工商业概况专辑（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梧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组编
1982年9月

目 录

鸦片烟土行业史

.....招荫庭 范子溪整理 (1)

颜料行业兴替史

.....李亿中 黎葦梧 (16)

清末以来各个时期开办的机器厂

.....邓 端 利 京 利桂生 王敬宽 (32)

旅宿业发展的四个时期

.....梧州市工商联 (43)

饮食业的兴衰变化

.....梧州市工商联供稿 黎葦梧整理 (50)

工业史料片断

.....骆鉴清 戚裴君 何锡中 何时才等 (63)

柴炭出口业琐记

.....陈 铁 (74)

土制煤油业简史

.....林邦彦 林蛙江 (77)

鸦片烟土行业史

招荫庭 范子溪整理

帝国主义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远自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英国商人就将大批鸦片经广东进口转销全国，各地吸食鸦片的人渐多，屡禁无效。当时清朝遣派林则徐往广东查禁。林则徐至粤，迫英人交出鸦片二万余箱，焚之，驱英人出澳门。英帝国主义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派战舰入侵我国，遂爆发了我国反帝史上有名的鸦片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在1842年与英订立《南京条约》。这是我国与外国订立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开端，也是鸦片在我国公开吸食、贩运、经营合法化的始原。

梧州市地处广东毗邻，因而鸦片烟土的经营也远在一百年以前。清末，梧州已有烟土行业的组织，当时称为“云茶业”。因云南省出产普洱茶，压成茶饼，状似烟土，而烟土又以云南最盛产，故诡称“云茶”。当时在梧经营此行业最著者为福隆银号（前身是怡昌泰）的经理人梁仲唐（花名牛仔裔）及黄泰初、陈大德等人，并有张广和、大有祥（现五坊路）、义利祥（出资人陈镜棠等，经理梁月余是苍梧长洲乡人，店址设在现五坊路与小南路转角附近）。转入民国，官方曾一度提出禁烟，上述各商号表面上停止营业，结帮私运亦转入秘密状态，市面上公开经营贩运似已绝迹。1915年（民四年）末，以蔡愕、唐继尧、李烈钧、熊克武等为首的

讨袁军，以云南省为中心，联合西南各省反对袁世凯称帝，由于军队调动频繁，军队包运烟土一时遂为军中的主要财源，私运、私营者日众，烟土在梧州市场又复活跃，从秘密逐步变为公开，禁令已成废纸。但这种经营多数已为官僚所操纵。当时任梧州市守史的韦荣昌，营运烟土尤为猖獗，派其连长韦玉山专司其事，在营房大秤大卖。同时，云南督军唐继尧亦派有一参谋陈竹斋在梧开设济通公司专做这项生意。贵州督军卢涛光在百色开设兴隆公司贩运烟土来梧，后又派其司理苏发祥到梧与韦荣昌洽商开设分庄，后因卢为周西成军阀驱逐下野，故未成立。

自此以后，私商在梧亦渐公开设店经营鸦片。民五、六年间在锁龙桥（今大东上路与中山路交界附近）开设有曹合利等数家。民七年在竹安路又增开成昌泰、年丰盛、达时昌和其他两三家；在四方井附近及其他街道又设有吹烟馆十多家，公开吸食鸦片。民八、九年以后，经营烟土的批发商陆续增多，有裕生、广新、同兴等八、九家。吹烟馆（门口招牌是×××谈话室）在四方井附近有“天上天”、“天外天”等十余家，其余“乐其中”、“一乐也”等十数家分散在各街道。

民十四年以前，该行业的情况资料不多，仅如上述。以下着重写从1926年——1935年这个行业的情况：

一、商号情况

梧州市经营烟土的批发、零拆商号共有三、四十家之多，加上营业额大，对市场资金有一定影响，因而独立成为一个行业，组织了同业公会，名为联安堂（公会主席邓善

卿，干事吕桂聪）。此外，有二、三十家专供人吸食鸦片的烟馆（最初叫谈话室，后叫戒烟室）。其虽属该行业范围，但不加入同业公会。至于个人走帮经营贩运烟土，从云、贵贩运来梧的，数量虽不少，但属行商走帮性质，故亦不加入同业公会。这段期间，各商号的名称及经理人是：

批发商有二十家

仁生		经理人	李鏞钧	
裕生		" "	许镜仁	
恒安和		" "	杨贵和	
恒福昌（前身会泰）		" "	朱耀三	
同裕（前身万泰祥）		" "	雷式和	
安发		" "	谢恩甫	
裕记庄		" "	卜鹤廷	
桂成行	经理人	正：郑健民	副：潘殿修	肖若云
兴发	" "	谢恩甫		买手：潘亦五
广新	" "	罗臻林		
交泰	" "	周健材		
兴源	" "	谢仲文		
同兴	" "	邝伯欤		
仍昌	" "	梁旭培		
盈丰泰	" "	范铁如		
合昌	" "	蔡觐文		
公发	" "	陈楚帆		
恒兴荣	" "	邓泽光	代理人：邓善卿	
东生	" "	邝伯欤		
康吉堂	" "	汤吉泉		

零拆商号有二十余家，但闻名的有十余家，如谦和、安、宏信、安利、安和、昭信、裕祥、裕安等。

吹烟馆有二、三十家（多集中在四方井附近，其余有十家八家散设各街道）。

个人走帮经营烟土的，先后有梁仲唐、黄泰初、吕揖堂、许镜仁、梁挺秀、谢德甫、黄天泽、黎旺平、罗臻林、杨贵和、李品芾、李宗唐、杨绍明、袁九如等人，这批人当中，尤以梁仲唐、黄泰初、吕揖堂赚钱最多，前两人都是贩运烟土发家的。

二、纳税和走私情况

烟土产地主要是云南、贵州两省，入广西经南宁、柳州两地转运梧州。在产地起运前，先分别在云南、贵州缴纳省税。进入广西境后，又在南宁或柳州课广西省税，称为甲花税，完税后派军队随船押运至梧，抵梧后必须先雇请搬运工人（每两箱为一担，运费白银二角伍分），从船上挑至码头排好队，清点箱数无误，由军队押送集中到梧州禁烟督察处（地址在现东中路），自己开箱，由局派专人逐件、逐块贴花，加盖骑缝印，发给完税照，缴纳地方税，称为乙花税，才能运回商店销售。因此，在梧州批发商出售的鸦片，已经过三次纳税（至于在云、贵课省税若干则不清楚，在广西每百两鸦片缴纳甲、乙花税各为白银二十五元）。零拆商号出售，则不需再缴纳税款。吹烟馆亦不再收鸦片税，但每盏烟灯每月按灯数缴烟灯捐（捐款若干不详），在家庭开灯吹亦按月收烟灯捐。至于临时开灯，每次每枝收捐一元二角。外地来本市购买烟土，可到“督察局”办理分票手续，凭分票

可运往广西境内各地销售，不再课税。但分票额最低三十两，而运出省境则再在邻省课入省税。例如广东烟土商号每月一次用军舰来梧购买（防半途被盗贼抢劫），每次三、五千箱之多，抵粤后缴纳广东省税出售。

此外，不管批发，另售、吹烟馆均需领牌照，缴纳牌照税，分甲、乙、丙三级，甲级商号每季度缴一百多元，乙级缴六、七十元，丙级四、五十元。吹烟馆每季牌照税最高甲级在三元以上，十元以下。

除了纳税公开出售之外，走私漏税的烟土为数也不少。从走私来梧或运出的路线说有两条，一是从邕、柳走私到梧州；二是从梧州走私到广东、香港。前一条主要是押运大批已纳税的烟土的押运员，个人从中夹带一些私货来梧；后一条路是一些轮船的员工或水客，从陆路或水路，但以水路为主，走私出广东、香港销售。从走私的数量来说分两种，一种是少量零星的，从几两到几十两，最多不超过一百两，另一种是大量的武装走私，数目每次多至十万两，如梧州市公发庄，专走私鸦片运广东，勾结广东军阀陈济棠，用军队武装整船押运。如九坊路中泰行本来是一家专经营帽子的商号，经理人曹觉非，他勾结江大、江固、江巩等兵舰，联合走私往广东，一次多达一万两以上。更有勾结英帝国主义，用停泊在梧州的英国军舰“摩轩”、“摩乎”整船走私运广东。此外，凡是反动派军队调防，也是大量走私烟土的好机会，不论官兵，人人都私带烟土，所以在旧社会，凡是这些军队所到之地，鸦片价格立刻下降，可见其走私数目之大。

上述两条走私烟土路线，仅从进出梧州市烟土的角度而言，也只限于是走私的烟土而不包括纳正税的情况。那么，

云、贵出产的大量烟土又是经过那些路径和办法进入广西境，特别是进入南宁、柳州两地的呢？

一、鸦片烟（罌粟）在广西有极少量的种植，主要是在省西北边远地区，官府鞭长莫及的偏僻农村进行偷种，但为数不多，产量有限，只供产地附近销售，极少量运至南宁、柳州。所以大量在邕、柳出售的都是云、贵产品。据不完全统计，从云、贵输入广西集散者可分如下路径：

①由黎平府，经大苗山，过西延县经全州一路（数目不很大）。

②由黎平府，经大苗山，过龙胜入桂林陆行一路（数目不很大）。

③由榕江县水运至三江县长安折东上桂林一路（数目不很大）。

④由榕江县水运至三江县长安折东上桂林一路（数目亦小）。

⑤由榕江县水运至三江县长安下柳州船载一路（数目颇大）。

⑥由都匀、独山陆运马驮至宜山下柳州一路（数目亦大）。

⑦红河边县数县小路运入广西者，有数支路算一路（数目亦大）。

⑧由红河边旧州马驮运百色下邕梧一路（数目居第一位）。

⑨剥隘运百色下邕、梧一路（称滇货）（数目亦大）。

⑩由滇边运经响水，出海渊入灵山、钦廉者一路（数目大，千人上帮）。

⑩由滇边运往南宁……（不甚详）一路（数目不详）。

上述输入广西路线的鸦片，包括纳正税和走私两种，纳税的多从⑤⑥⑧⑨四条路进入，走私的各路均有若干，但⑩路基本上是走私货，而且是千人上帮的武装走私。

三、业务经营情况

（一）批发商的业务经营：

1926年——1935年这个时期，是烟土行业最兴旺的时期，批发商号达二十家之多。据当时经营该行业的人估计，1935年全市销售烟土达六、七千万两之多（走私的数目还未计在内），按当时价格计算，营业额达白银一亿元以上（以每两价格白银二元计算），因而同当时的银钱业有密切的联系，对整个市场也有一定影响。

鸦片，当时人皆称为“特货”。所以称“特货”，一是必须有税、有花、有印才能公开出售；二是不属于一般人的消费品；三是经营这些商品的商号，特别是批发商号，都与反动官僚、黑社会势力（如青红帮）或帝国主义在本地设立的洋行买办有一定的勾结并以他们作后台。例如桂成行经理郑健民，他的后台老板是新桂系的伪财政厅长黄锺岳。恒安和的经理杨贵和、广新的经理罗臻林，都与当时的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有往来勾结。裕生行的经理许镜仁，本身就是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梧州的代理人，从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出帝、官、封的势力，直接插手于这个行业。注（1）

（二）零售商的业务经营情况

这段时间，烟土的零售商共有二十余家，但闻名的只有十余家（商号名称详见前面所述），这十余家中，尤以昭信、

安和、安利、谦和几家较大，资金较多。销售商号的进货货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与本市批发商原箱购入，用赊进（一般分五天付款，十天付款、十五天付款三种方式）和现款购买两种，而这方面的进货，均属有税、有花、有证的烟土；二是与上游走私来梧的帮客购进，现款交易，均属无税、无花、无证的烟土。销售方面，主要是售给走私往广东、香港的水客，占全部销售额80%以上，其余小部分售给本市吹烟馆及附近四乡的零拆店。正税货的批零差价，一般是10%的利润，如果出售无税的走私货，利润则为30%。

零售商出售的鸦片，分生烟与熟膏两种。生烟主要分贵州货与云南货两类，而云南货又分枕庄、罗克、云饼三种规格。贵州货与云南货相比，以云南货质优价高。云南货三种规格中，以枕庄货售价最高。熟膏是由生烟煮炼而成，这也是零售商经营业务之一，其制炼过程是每次将生烟100两用铜锅加水煮煎，用疏布筛去杂质，反复四次共煮十个小时才成熟膏。经过点炼，云南货可得回八成（即生烟十两可得熟膏八两）。贵州货仅得回六——七成。当时生烟价格每两二元左右，熟膏则为每两二元八角。

安和是当时零售商中较大的一家，设在今居仁路，经理人李国平，该店有职工五人（其他小店一般只有二至三人），是零售商中资金较多的一家（具体数字不详），每天零售烟土达一千两以上（其他小字号每天只销售三、四百两）。为什么该号生意特别好呢？主要采取以下几种经营方法：

第一，该号主要销售对象是行驶下游广州、香港等地的轮船或木货船的船上职工，这些人利用在船上工作的有利条件，巧造各种形式的“暗仓”进行收藏鸦片走私，该号能适

应顾客的要求，按来客“暗仓”尺寸、形状，将鸦片用油纸包装成长方、正方、圆形……等各种规格，以利收藏，故甚得顾客欢迎。

第二，采取赊销给走私客的办法，与同业抢生意，争顾客。走私，这是一项冒风险的生意，所以它采取不是全部赊销，而是收现款70%—80%，赊销额一般最高不超过货款30%，同时规定每次先清旧帐再赊新帐。

第三，该号同本市伪警察局的“密侦”有一定的联系和勾结，凡是出售无税的私烟，可以派“密侦”作保镖保送落船，使顾客放心购买。如出售有税烟土，由于在本市可自由通行，故由顾客直接到店提货。

第四，该店资金较多，经常利用批发商急需现款纳税降价出售的机会，大量进货，因而在正常市价出售时盈利都比别家多。

由于上述原因，故该号在禁烟而结束时，仍拥有资金桂钞一百多万元。

此外零售店中的谦和，经理人黄杏庄，其经营特点是专门加工熟膏，成品用铜质的小盒装载，分一两庄、五两庄两种规格，并在铜盒面刻有鹰唛作为商标。由于该号选优质货并精心制作，迎合吹烟顾客携带方便，因此不仅在本市甚为畅销，而且走私出广东、香港也极畅销。通过加工装璜，每百两可多获利8—10元，故该号此项生意每月可获利四、五千元。因利之所在，不久本市有人仿制“鹰唛”冒牌货，由于质次，在市场上鱼目混珠，鹰唛信誉受到一定影响，继而同业中的宏信号（经理人卢礼祥，花名谋人祥）。亦仿效规格出品三羊牌丸膏，它在广东、香港享誉虽不如鹰唛，但

其价格略平些，故亦能争夺一部分市场。

（三）吹烟馆的业务经营情况

吹烟馆，是公开吸鸦片的场所，经营规模虽然很小，但却是在藏污纳垢的地方，作奸犯科的人，不少是睡在烟床上出的鬼主意。梧州市是云、贵两省烟土主要集散地之一，吹烟馆的设立，更遍及全市每个角落。在1926—1935年这段期间，以四方井附近最为集中，达十多二十家，加上赌馆以及为烟馆、赌馆服务的小食店，真是成行成市，盛极一时。

吹烟馆主要是向本市零售商购入生烟或熟膏，以一、二钱或数分拆给烟客吸食。如购入生烟，必须经过自己煮炼成熟膏才能出售。烟馆不再缴纳烟税，但必须向官方领取牌照，按烟灯枝数缴纳烟灯捐。

吸食鸦片，不仅可在公开设立的烟馆，当时在一些比较大的商号，如平码经纪业的公昌（清末民初开设）、黄安隆（在1926—1935年期间），与及潘耀洲开设的美祥纸料店等等，都向官方缴纳烟灯捐，在店内开设烟局，招徕顾客，边吹边谈生意经。不少官僚、富商如黄天泽、林旭初及吕揖堂等，更在家开灯专吸进口的所谓“金庄”鸦片（每两比云贵鸦片贵十倍）。在抚河，更是嫖、赌、饮、吹的集中场所，反动政府只管收税，嫖收花捐，赌“麻将牌”收麻将捐，饮收筵席捐，吹烟收烟灯捐，应有尽有。还有不少在家私开烟灯自己吸食，同时招引其他烟客吸食者，此种私开私吸鸦片的人，随时有被捉拿归案，坐牢罚款的危险。这些私设烟灯的住家，影响了吹烟馆的业务经营，使吹烟馆减少生意，故开烟馆的老板，经常向官方告密捉拿私开烟灯的人。

抗战前一些时间，国民党反动派又提出所谓“寓禁于

征”，乘机加重烟税，提高烟价，中饱私囊。梧州市的地方反动势力，更美其名曰“加强管理，以利禁烟”。至此，在全市私人开设的吹烟馆宣告绝迹。但官方另出花样，规定在城南、城中、城北、河滨四镇各设烟馆一间，由私人向反动政府当局投票承开，吸食者正式领取烟证，但一人领证也可借给别人吹。因而吹烟之风不但未见减弱，相反，更为公开、合法和盛行。

四、烟土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关系 和对市场的影响

梧州自1897年开辟为通商口岸后，大批“洋货”如百货、花纱、布匹、火油、化工原料等经广东、香港涌进，云、贵盛产的烟土亦大批到梧州集散运至广东、香港。云、贵的烟土，在梧州出售以后，由于数量大、价值高，大量现金投放市场，其出路主要是购买“洋货”运回云、贵销售。由于烟土、“洋货”的对流运销均获厚利，并以梧州为集散，因此，烟土行业的兴盛，大大刺激了梧州百货、花纱、布匹、火油、化工原料、海味杂货等经营进口货物行业的发展。

银钱业与烟土行业也有密切的关系，上面已经谈过。

由于云、贵烟土帮客云集梧州，这些帮客因为盈利多，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因而也刺激了梧州饮食、旅宿行业的发展。

当然，烟土行业的本身，是一个毒害人民的行业，对整个国计民生只能起消极、破坏、瓦解的作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对梧州商业却起着刺激发展的作用，使一些行业得到畸形的发展。

五、烟土行业的尾声和鸦片毒害的延续

1936年“六·一”事变两广反蒋之后，烟土行业从黄金时期转向衰落，原因是云南、贵州两省的烟土绝大部分不再经广西，而经四川从长江水路运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笼络人心，对于为中国人民所长期深恶痛绝的鸦片烟毒，不得不表示改变一下那种公开、合法出售鸦片和开吹烟馆的法令，宣布禁种、禁贩运、禁出售、禁吸食，又规定经营鸦片的商号限期停业，存货一律封存，吹烟馆一律关闭的命令。一时私开烟灯的被捉，私吸的挨坐牢。从此宣告了整个烟土行业的结束。

但是，在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统治时代，贪污腐化，阳一套，阴一套，是常见不怪的，吹烟馆公开的没有了，而暗在家中私开烟灯招引烟客吸食的大不乏人。当时反动当局为了掩人耳目，从中勒索钱财，对那些私开烟馆和私吸鸦片而又无权无势的平民，四出搜捕，全市经常有五、七十人被拉坐牢。当时这些“烟犯”均由伪梧州专员公署苏××军法官承审，择肥而噬，钱多者，多勒索，行贿送礼者可立刻放人，无钱者判刑坐牢。但是，反动官僚政客的家，却烟灯常明，烟客常满，安然无事，更可坐收渔人之利。比如在1939—1940年间，伪梧州防空指挥部的副司令沈仲熙（他本人吸食鸦片）、伪梧州专员公署上校参议黄云都开烟灯两枝供人到家吸食，梧州洪帮头面人物黄天泽的家里，也开烟灯数枝供人吸食。公开经营烟土的批发、零售商号都没有了。但是由反动官僚暗中贩运买卖烟土的事仍然出现，如1941年初杨贵和（原恒安和经理人），在香港勾结青帮头子杜月笙，将所谓

封存的鸦片二十箱运往香港出售。又如1946年，沙街（现南堤路）的巨盛行、恒信行表面是平码经纪业，但勾结反动官僚暗中贩运买卖成批的鸦片。

事实说明，虽然在1940年春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全国已禁种、禁运、禁吸鸦片，但鸦片对梧州市人民的毒害，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以至解放初期1952年大张旗鼓禁烟禁毒运动开展前的一段时间。

六、鸦片烟毒的为害和彻底的禁绝

鸦片烟来自罂粟花的果实。罂粟农历九月种，三月收，花谢蒂结，烟农以刀划开蒂果，渗出白浆，次日收之刮入碗内，积少成多，分以小碗盛之曝晒，水气渐干，团成个数，裹以柴灰便成，烟商收购后打叠成箱运销各地。

鸦片含吗啡毒素，原属麻醉、兴奋剂药物，人吸食后“上瘾”，长期吸食使人意志衰退，生理机能失调，骨瘦如文，更延祸子孙后代。对鸦片为害，林则徐曾云：“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既无可筹之饷，更将无可御之兵……”。语之沉痛，意义深长。

在梧州市，自从鸦片公开贩运、吸食以后，少数经营、贩运、走私者发了大财，但是广大劳动人民却深受毒害。旧社会由于吸食鸦片以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卖儿卖女的真是难以数计。民十四年间，水街（现大南路）有一家独资经营代客买货兼自营土产的南昌号，经理人张耀南是梧州富商之一，民18年间去世，遗下家产白银十多万元，有两个儿子，大儿张沛，次儿张池，父死后，其兄弟二人不务正业，整日睡在烟床上吞云吐雾，同时更别开生面，每人每次均用烟

枪三枝，用两个鼻孔和嘴巴同时吸食，需两人在旁服侍。结果由于吹、嫖、饮、赌，不够两年时间，将十多万元遗产全部花光，张沛的老婆由于屡劝其夫戒烟不听，写下绝命书自杀，家破人亡。该绝命书曾在当时报纸连续登载数天，轰动一时。后来两兄弟无以为生。往原来在店当职工，后当上老板的何长英、谢柄所开设的荣信行做“挂单食客”。

在广大劳动人民中，亦有不少由于吸食鸦片而造成家破人亡的，如在民廿七、八年间曾在本市交泰烟土批发商做杂工的工人刘桐，由于他在烟土行做工时染上了烟瘾，该号结束后，无事可做，家有妻及子女四人，维持生活已不容易，每日还要吹鸦片，迫得在家私开烟灯招引烟客，至先后被拉坐牢十多次，而每次释放回家后又立刻继续私开烟局，结果最后被判无期徒刑，妻儿随街沿门托钵乞食，一个孩子饿死，陈桐在狱，直至梧州沦陷才逃出监牢。鸦片烟毒，祸害之深可见一斑。

总之，在解放前这些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1949年11月梧州解放，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怀人民的健康，于1952年开展大张旗鼓的禁烟禁毒运动，彻底清除吸食鸦片，从此，结束了一百多年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历史。

七、后 记

本文主要是根据陆冠芝、陈汝揖、雷鸣、梁润、潘梓材等人口述记录整理，同时参考一些有关史料写成。在这些人当中，陆冠芝现年八十八岁，在梧州市经营商业有七十年的历史，他对本文所写的史实和有关材料的核对，提供了不少的意见。陈汝揖现年八十五岁，也是老梧州，在旧社会官场